

《客家纵横》增刊

宁化客家研究

(三)

宁化县客家研究会编

主编 张恩庭

刘善群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弘扬客家精神 ●振兴客家祖地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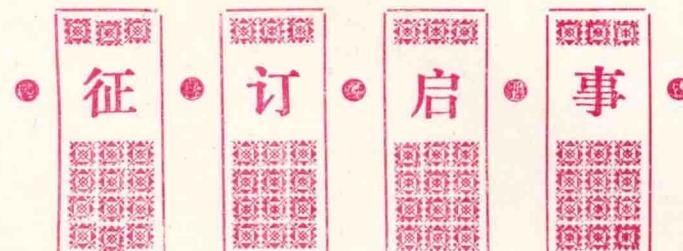


石碧石客家祖地

林成武



新编《宁化县志》



宁化县位于福建省西部，与江西省石城县毗邻，建县于唐开元十三年，迄今已有一千二百余年的历史。

宁化县是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也是客家文化的发祥地。在二次客家大迁徙中，境内的石碧曾盛极一时，成为大多数客家人的祖居地。范仲淹、洪秀全、刘永福、丘逢甲、郭沫若以及李光耀、李登辉等著名人士都是宁化发祖的，清代著名学者李世熊、“扬州八怪”的佼佼者黄慎、著名书法家伊秉绶都世居宁化，留下丰富的宝贵文物。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宁化县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年毛泽东率领工农红军“直指武夷山下”，掀起了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境内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天鹅溶洞群犹如地下仙阁，被誉为天下一绝。同时这里还是国家的商品粮和烤烟基地。所以宁化享有革命老区、客家摇篮、文人之乡、旅游胜地、烟仓粮库之誉。

宁化历史上曾编修五部县志，清康熙李世熊编纂的《宁化县志》被称为天下名志。新编《宁化县志》上溯事物发端，下限1987年，有的事物延至1990年。采用小篇结构，除概述、大事记、附录外，设35卷分志。共130万字，并有照片近百幅，全面系统地记述

了宁化的自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既继承了地方志的优良传统，又大胆地创新，突出了地方特色，比较翔实地记述了各时期政党、政府及社会团体的重大活动，在人口志中还记述了历史上客家姓氏在宁化的流迁情况，“附录”载有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是一部体例完备，资料丰富，内容翔实，较有特色的的新县志。经省、市、县各级领导和专家的反复审查，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本志书16开本，漆布烫金，外加彩色护封，激光照排，由福建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和福建新华印刷厂分别承印彩照和正文，印工精细。于1992年6月出版发行，每册定价50元，外地加邮资3元，欢迎订购。

信 汇：

户 头 宁化县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

开 户 行 工商行宁化县支行

帐 号 88001

邮 汇：宁化县人民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张河石收

邮政编码：365400

福建省宁化县县志编委办公室

一九九二年三月廿五日

辛未初夏

石壁勝地客家之根

黃典誠



宁化客家研究

第二期

一九九二年五月

● 吴福文

● 陈国强

● 李逢蕊

● 黄典诚

本刊顾问

客家流迁中徙居宁化播衍各地的部分姓氏世系绍介 ······

刘善群

余兆廷

54

客家民系在宁化(石壁)的形成及其播衍 ······

余兆廷

46

客家民系的形成和客家精神的发展 ······

廖楚强

37

关于客家民系形成的中心地域探讨 ······

刘善群

20

客家的摇篮宁化石碧 ······

黄火兴

12

宁化石碧客家研究的意义 ······

陈国强

周立方

9

宁化石壁村考 ······

罗香林

16

客家源流考察纪行 ······

广东梅州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

1

杨成武同志、黄典诚教授题词 ······

1
3

■ ■ ■ 美术设计 张仁藩
责任编辑 张仁藩
主编 张恩庭 刘善群

● 发行范围

公开发行

● 发行刊号

国内统一刊号 CN31—1016

(福建省宁化县翠江镇中山路一号)

《宁化客家研究》(《客家纵横》增刊)编辑室

● 出版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编
辑

《历史教学问题》编辑部

谢起光

74

石碧村的由来

戈丁

74

石壁地名之我见

谢起光

74

风展红旗如画

冯慧莲

56

考察纪行诗草选

黄大兴

45

客家祖地石碧

蔡其娇

33

石碧建设规划正在全面实施中

刘舟

44

1991年石碧客家祖地对外宣传工作取得新成效

刘善群

8

石碧客家习俗风情(一)

张仁藩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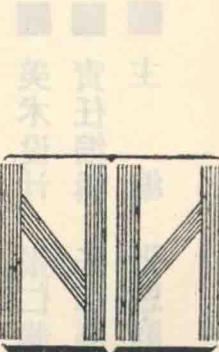
宁化客家名流选

吴世光

34

目

录



客家源流考察纪行

——广东梅州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

赴中原、闽赣考察报告

为了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扩大对外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1991年9月24日至10月27日，广东梅州客家历史文化考察团（以下简称考察团）到了中原、中南、华东9省15个县市，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考察活动。考察团由梅州客家联谊会、嘉应大学、嘉应民俗学会联合组成。梅州客家联谊会客家历史文化研究部副部长、嘉应民俗学会副会长陈美豪任团长，成员有：华东师范大学客家人研究室副主任、嘉应大学政史系副教授刘南彪，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会员、原梅州市文联副主席刘天一，辽宁大学民俗学、民间文艺硕士研究生、中国民俗语言学会会员凌双匡，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作家黄火兴等5人。考察团此行的主要使命是：循着客家先民一千多年间的历史和生活轨迹，深入实地、对客家历史、文化作多学科、深层次调查考察。

北望中原怀故土，慎终追远不忘根。考察团带着梅州客家人民的深情厚望，风尘千里北上中原。首途从广州经湖南、湖北抵达河南省信阳地区淮河两岸的光山、固始、潢川、还深入到鄂豫皖边区的大别山腹地——新县，再由淮阳、开封，经安徽、江苏、上海、进入江西省的景德镇、南丰等县，重点考察了赣南的石城县和闽西的宁化县石壁乡，行程5000余公里。考察团所到之处，都

受到当地乡亲和各级党政领导、方志办以及文化部门的热情接待和大力支持。信阳市副市长、石县政府副县长、政协主席、宁化县四套领导班子负责人、河南大学校长，党委书记以及上海华东师大著名历史学家吴泽教授等，亲自接见和会见考察团全体人员，对考察团此行作出高度评价并提供许多方便。信阳市副市长陈民说：“中原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欢迎海内外炎黄子孙有机会回老家寻根问祖，梅州客家考察团此行是很好的开端。”吴泽教授说：“梅州客家考察团此行意义深远，必将促进客家学的建设。客家是中原汉族的一支民系，是中原文化化的主体，对客家历史文化的研究，就是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项具体工作，也是对研究我国民族史、东方史、华侨史的重要突破口。”

一路上考察团采取广泛接触与深入采访相结合的办法，利用一切机会观察沿途各地的民俗风情、查阅和收集当地史志资料和民间收藏的姓氏宗谱，对可作考证的历史文物和民俗事象，如为各地不同风格的民居建筑、祠堂、庙宇、墓葬、出土文物、穿戴服饰、生活用具以及方言、民歌等等，都分别进行拍照或录音。共收集到各种文字资料约三百余万字，照片二百余幅、录音资料约三小时。考察团直接接触和采访的三百多人中，有农民、工人、城镇居民、中小学教师、

教授、市县乡村干部以及历史、民俗、语言、文化工作者，年龄最大的88岁。

此次考察活动由于得到梅州市委、市政府、各地有关领导部门、社会各界人士和乡亲们的支持，通过考察团全体成员的艰苦努力，通力合作，圆满地完成了考察任务，收到了预期的效果。主要收获是：（1）对客家历史、文化源流与发展状况及其所涉及的许多学术论争和历史悬念问题，有新的认识、新的发现。（2）收集掌握了一批有关客家研究的珍贵资料。（3）跟客家历史有关地区和学术界建立了广泛联系。

下面从六个方面谈谈此行考察的见闻。

中原先民的大迁徙和 “筷子巷”的传说

中原——这片古老的土地，曾经是孕育华夏民族的摇篮和中华文化的策源地，近千年经历无数兴衰，遭受过无数次劫难，发生过千百次天翻地覆的变化。中原古称中土，包括现今河南省全境以及跟河南毗邻的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安徽、湖北的部分地区。考察团此次所选定的主要考察地域，是淮河中游的豫东南地区，这里是古光州所在地，是广东梅州许多姓氏族谱中都有记载的客家先民祖居地。古光州直隶州包括今潢川、光山、固始、新县、商城、息县六个县，现辖属信阳地区。

考察团从淮河上游的信阳市到毗邻安徽的固始县，从横贯鄂豫皖边区的大别山区到黄河之滨的开封，纵横千里，希望能够从这片客家先民的祖居地找到历史之根，文化之源。

从考察当地的历史典籍、文化遗址和乡亲们的口碑中，我们发现：在近一千多年间，中原地区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期间，中原地区曾经发生过三次社会大动荡，造成了中原先民的大迁移。据旧《光州志》载（清

顺治十七年版）：唐（玄宗）天宝年间，是光州户口鼎盛时期，州属四县得三万一千四百七十二户，一十九万八千五百八十口。至宋（徽宗）崇宁年间，户口骤减至一万二千二百六十户，一十五万六千四百六十口。迨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光州户口降到最低点，仅剩二千一百六十七户，一万四千零六十三口。从唐天宝至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742—1372）的630年间，光州户口的大变动情况，反映出历史上中原地区曾经发生过的三次社会大动荡：一次是唐末“黄巢之乱”，继而出现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局面；第二次是发生在北宋末年金兵三次入侵中原的战乱；第三次是南宋末年元兵入侵及元朝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所采取的残酷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造成“中原地区荒凉残破、人口逃亡，生产衰微”。继西晋“五胡乱华”以后中原地区发生的三次社会大动荡，是造成中原先民大迁徙的重要原因。在这三次历史大劫难中，当时中原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是十分深重的，豫南一带就有“黄巢杀人八百万”和“七平光州”的传统。《中国通史》中也有一段记述：五代前期，北方地区频繁地遭受战争和自然灾害的破坏。昔日生产比较发达的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满目荒凉，疮痍千里。山西和关中地区也是‘赤地千里’、人烟断绝。水旱灾害特别多，朱全忠为阻止沙陀兵南下，曾开掘滑县（河南省东北部）附近的黄河堤，泛滥数千里，漂溺数万户，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难以数计。百姓流离失所，土地大量荒芜，中原许多地方、“田无麦禾，邑无烟火者，将近十年。有的地方因灾害而逃亡者千万计”。……“北宋末年，随着金兵的南侵，中原人民纷纷南迁，到南宋建炎以后，江南、两浙、荆湖、岭南、福建等地，出现西、北流离之人偏满的现象。这次流民南徙是继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人口大迁移”。

这一千多年间，中原先民的三次大迁徙，都迁到哪里去了？还有没有一些未曾外迁而一直留在当地的先民后裔？现在中原居民的祖先又是由何处迁来的？考察团带着这些疑问去寻求答案。这类答案在正史中找不到，却从当地的老一辈居民的民间保留的姓氏族谱中找到了许多新的线索。在光山、固始、潢川、新县的许多姓氏族谱中都有关于唐末“黄巢之乱”或宋室南渡时举族外迁的记载。现居住在豫南地区的居民的祖先很大部分是明、清期间从江西、湖北、安徽、江苏、山西等地迁来的。据光山县一位六十七岁的老文化馆长介绍：“在光山一带有一个传说，唐末时黄巢杀人八百万，不管男女老幼都过刀，光山都无人烟了。这里的人不是被杀光了，就逃到江西去了，现在光山的人多是明洪武二年以后陆续从江西迁回来的。”光山县赵氏宗谱载：“赵宋之后避敌于闽广间，其子孙蕃衍散于江左江右，至今数百年矣。念始祖杉公原籍江西鄱阳县瓦屑坝双港桥筷子巷赵家湾，一经元乱于明初经由鄂麻迁河南光邑。”据了解，光山县现有三百多个姓氏的祖先，大多数都是在唐末和北宋末年迁去江西鄱阳湖一带，明代初年才陆续回迁的。从豫南各县有一种习俗也很能说明问题。这里大多数姓氏的居民在过年祭祖时，都要在供品上插三双筷子，以示不忘祖先是从江西筷子巷来的。但是也有少数姓氏在祭祖的供品上不是插筷子，而是插刀子。对这种习俗也有两种传说：一说是在黄巢之乱时，潢川只有高、王两姓的祖先因躲藏在古墓穴中没被杀掉；另一说是在新县的陈姓祖先因藏身在深山石洞里才幸存下来。这种祭祖时插刀子的习俗是为了纪念祖先刀下余生。

专访大别山

矗立于中原大地，横亘鄂豫皖八百里的大别山，像一道天然屏障把黄河、长江分隔

两边。这里是历代中原农民起义和两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的重要根据地，也是客家先民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中原先民历次南迁，都要通过大别山的13道山口进入湖北、安徽、闽粤赣等地。据梅州一位新四军的老前辈说，他在四十年代在大别山路过一处山区时，曾亲闻当地乡亲讲类似今天梅县的客家话。现在梅州及闽赣等地的客家方言是不是从中原带来的？或能不能在那里找到客家话的母语？考察团带着这个问题在河南的南部和中部各县作了方言调查，并专程进入到大别山南部当年新四军曾经活动过的山区——新县箭厂河乡的黄谷畈村，和固始县段集的五尖山村，这里是豫南地区往湖北和安徽的主要通道。进入山区以后，沿途的山村景色、田园房舍都跟梅州各地的山区非常相似，考察团的同事们都有种回到了家乡的亲切感。当我们跟当地老乡一接触，才知道他们这里各姓氏的祖先也是明清时期由江西、湖北迁来的，都是“猪头上插筷子”的后裔。当地居民所讲的方言也是带有湖北语音的豫南话，属北方方言。当考察团人员用客家话跟他们交谈，问他们有没有听过上辈人讲这种话，都说从未听过。而据箭厂河乡的一位姓陈的干部说，他村里还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会讲一种土话，他们后生辈都听不太懂。据当地人说这个姓陈的村子，就是当年躲在山洞里没有被黄巢杀掉的陈姓祖先的后代。至于他们讲的是怎么样的一种土话，因山路远不通车，无法亲临实地弄个明白，考察团的同事们因此觉得遗憾不已。

根系中原

考察团在豫南各地及北上淮阳开封考察过程中，都把当地的民俗风情和各种社会文化现象跟梅州相对照比较，发现两地在民俗风情上有很大的差异，而在深层文化上都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在方言、民居形式、

墓葬形式、民间文艺、岁时节日习俗、妇女社会地位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而在许多传统文化观念方面却是相同的。在广东的汉族三大民系中（客家、福佬、广府）都有详细的历史记载，说明他们的祖先是来自中原，特别是客家民系对根源意识尤为强烈，在客家地区不论是城市或农村，每到春节期间到处可以看到家家户户大门前贴的堂号、堂联，诸如“颍川堂”、“清河堂”、“江夏堂”、“南阳世泽”、“龙门世泽”……以表达对祖先故土的怀念。但是，对久远的历史和地理概念却是模糊的。此次，考察团有幸亲临祖先故土、考察了古黄国的黄城故地（在今潢川县西北六公里的隆古集），淮阳县古陈国、陈胡公祠、伏羲陵和太昊之墟——古城宛丘遗址。

黄国为全国黄姓之源，始于颛顼高阳氏之后，周成王封诸侯南陆公于黄，是为黄国，乃以国为姓。黄城约建于公元前11世纪，呈长方形、南北长1800米，东西宽1500米，占地面积27万平方米。墙高约5米，全以生土夯成。城外有护城河环绕，地势辽阔，十分壮观。1983年在距黄国故城西南20公里处（现属光山县），还发现一座黄国君墓，据发掘考证，是公元前648年前春秋早期的黄国君孟和夫人孟姬的合葬墓。

陈国故都在今河南周口地区淮阳县，古称陈州。陈州府志叙：“陈为伏羲氏建都地，神农氏（炎帝）因其旧而都之，故名之曰陈”。周代置陈国。在距陈州城东南八里的平粮台，就是1980年由国家文物部门发掘出土的“太昊伏羲氏都宛丘”的古城遗址，面积近百亩。据专家考证，是距今4600多年前属龙山文化的古城址，是直到目前为止我国考古发现的时代最早、面积最大、保留最好的古城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国家的起源，早期奴隶社会的形成都具有重大价值。伏羲氏被称为我国“三皇”、“五

帝”之首，他在这里创立了华夏民族的远古文明，他画八卦、分阴阳、作网罟、教民渔猎、定姓氏、制嫁娶，以龙为纪，号曰“龙师”，将龙定为图腾族徽，今天称中华民族为“龙的传人”就是来源于此。在今淮阳城内还完好地保留下始建于汉代的太昊陵，占地八百多亩。附近还有伏羲画卦台、白龟池等遗址。

陈国又是全国陈姓之源。据《史记·陈杞世家》载：“陈胡公满者，帝舜之后也，封于陈，是为胡公。”自此，以国为姓，陈胡公为天下陈姓始祖。陈胡公铁墓在淮阳城东南柳湖。世传其墓用铁铸成在壕内。陈胡公祠遗址亦在城南门外湖中小岛上，占地约30亩，风景优美，但大部分已被改建为民居，仅存后座司城贞子阁。

中华民族是由众多的民族、民系和姓氏宗族家庭组成的民族大家庭，姓产生于母系社会，原本表示妇女世代相传的血统关系，主要起着“明血缘”、“别婚姻”的作用；氏原为姓的分支，起源于父系氏族社会，最初是表示部落支系的居住地，往往以图腾、徽号或地名为标志。到了封建社会则“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更多的出现以封国、封地、官号为姓或由帝王赐姓。伏羲“定姓氏”、商周封百国，我国绝大多数姓氏（尤其是汉族姓氏）都是起源于中原，而后经过历次民族的迁徙和交流，广布海内外。仅举闽粤福佬语系诸姓氏为例，据《固始县志》载：“西晋永嘉二年（公元308年），中原板荡，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又唐总章（高宗）二年（公元669年）及唐垂拱（武后）二年（公元686年）先后两次随唐将陈政、陈元光父子（河南固始人）入闽的将士就有64姓氏7200人。又唐僖宗光启元年（公元885年），随王潮、王审知、王审知（河南固始县虎丘山人）三兄弟入

闽的五千义军（黄巢起义军）后来他们大多数在漳、莆、泉、潮州一带落籍，成为闽南、粤东诸姓的祖先。据考证，郑成功的祖先也是在唐僖宗光启年间，从河南光州固始入闽的。不论从民族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和姓氏渊源都足以说明：神州百姓根系中原。

客家摇篮

考察团在中原七市县留连了半个多月，我们都有一种若有所得，若有所失之感。所得者是使我们丰富了许多历史知识，开拓了视野，得到了不少珍贵资料和信息；然而又觉得如此久远的历史和中原的现实情况，跟我们原来的想像和希望相去甚远。带着这样的心情，我们从开封南下，经安徽、江苏进入江西南部的赣南地区，行程一千多公里。一路上所见所闻都感到是异乡情调。但是，当进入赣南的广昌时，开始有亲切感，到达石城以后，却有回到了家乡的强烈感觉。这里的老表们讲的虽带有浓厚“赣”味的客方言，却都能听得懂，属纯客县。据《石城县志》载：石城为客家百姓之地。自晋永嘉元年（357年）郑氏求安兄弟从古揭阳县（今宁都县境）来到小松下南桥落户，是现存谱牒所载最早迁入的客户。隋唐至五代十国石城建县前后凡600余年，先后有余、傅、胡、温、许、赖等20余姓迁入，两宋至清末，迁入姓氏已达百余姓。考察团发现，从石城的风俗民情和历史文化中，还保留着许多古老的传统，如丰富多彩的“彩灯闹新春”活动、民间采茶戏、木偶戏、大腔戏、竹板歌以及分布全县乡间的古老的木棚戏台、岁时节日和婚姻丧葬中的许多传统周礼古风以及民间的擂茶习俗等等。类似这些传统习俗在广东的客家地区已很少见。其中至今仍盛行于石城县城乡的婚嫁“对轿联”的习俗，最具有鲜明的客家文化特色。即当新娘子要过门的那天，由夫家派轿子去女家迎亲，夫家先在

轿门上贴一上联，轿子到达女家时，女家要把全族文化较高的人士请来，即席对出下联，如果对得不好或对不出下联，新娘子就不能上轿，女方全族的人都会“扫脸子”下不了场。这可能是（约定俗成）激励人们读书学文化的一种妙法。

在石城县的东边、穿过武夷山东麓山口二十五公里就是福建省宁化县石壁乡（现分为禾口淮土两个乡）是粤东地区许多客人都念念不忘的祖居地。我们在宁化县客家研究会会长、县志办主任刘善群（石壁人）的陪同下，到石壁考察访问了一整天。参观了近年来已修葺一新的刘氏家庙，黄氏宗祠和张氏宗祠，勘查了岭南李姓始祖火德公的出生地——李家坪，还到了传说中的客家先民避乱聚居地葛藤坑。古称石壁的地方是一个方圆三百多平方公里的山中大盆地，东北和西北面有巍峨的武夷山脉作天然屏障，整个石壁范围内回旋余地很大，丘陵起伏、山重水复，二百多个自然村分布在山坑丘壑之间，光葛藤坑现在就居住了两百多户人家，在石壁北部的一处山沟里还有个名叫千家围的地方，据说在明末清兵入侵时，邻近各地百姓举族迁来此处避难，达千户万余人。在当时乱世，石壁真正称得上是一块福地乐土。自唐代以来，此地均未受过重大兵祸影响，连当年的黄巢部队和日本侵略军都到不了这里。

宁化是闽西的纯客县，从（清）《宁化县志》所载该县各个历史时期户口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宁化县是客家先民南迁的重要聚居地。

宁化县建置较早，“古称黄连峒，隋代以前，名不见于史”。唐乾封年间（公元665—667年）设黄连镇，唐开元十三年始置黄连县，唐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改称宁化县。唐（高宗）上元年间（公元674年）这里还是高山大峒、森林茂密，地旷人稀的蛮

荒之地，全县仅有2600多户，多为土著人家。至了北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户口增至13,576户，至南宋（宁宗）庆元年间（1195—1200）户口猛增至34,700余户，到宋宝祐年间（1253—1258）宁化县户口达到最高峰，为37,238户，主客丁89,148人。（总人口约11余万）到清代初期顺治13年又下降为5,267户，37,888人。据当地姓氏资料统计，自唐末到南宋末年，迁入宁化的有61个姓氏：其中唐末29姓，宋32姓，主要来自江西和河南。南宋以后又陆续再由宁化迁往闽西、赣南和粤东各地。

从当地的史志和大量的民间姓氏谱牒记载，自唐代末年至南宋末年这一段历史时期，客家先民已经陆续从中原来到了武夷山脉南段、闽、赣、汀三江之源的青山绿水间生息了四百多年。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里是“山高皇帝远”的“世外桃源”。隋唐以后的五代十国时期，这里是谁也管不着的地方，从不称臣于任何一国，也不妄自称王立国。客家先民就在这里建立家园，繁衍子孙，继续沿袭着中原祖居地的生活方式，在这四百年间逐渐形成了具有客家民系特色的经济、文化区域。这一区域大概就在武夷山脉南段以赣南的石城、闽西的宁化为中心的大片山区，包括毗邻的宁都、瑞金、长汀、清流、归化的连片地区。

意外的发现

过去我们对客家问题的研究和认识，大都只局限于一时一地或书本资料的互相抄录，难免有以偏概全或以讹传讹之嫌。考察团此次赴中原、闽赣地区作实地考察，虽然时间较短，许多需要去调查的地方还来不及前去，也总算开始跳出了“井底”，开拓了视野，亲自看到、听到和接触到许多过去所不了解或不甚理解的问题。除了对上述如中原地区历史和文化的变迁，中原先民的避乱

外徙和回迁，中原先民的南迁与南方诸民系的关系，客家先民在赣南、闽西祖居地的历史与现况等问题，有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考察团还了解到三个意外的新情况。一是在河曲地区仍存在类客方言；二是江西鄱阳湖地区在客家先民迁徙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三是关于客家妇女的缠足问题。

考察团到开封河南大学访问一位梅州老乡丘菊贤教授时，遇见了该大学文学系的一位语言学专家曾光平先生，据称他近年到过河曲地区作方言调查，发现有类客方言的情况。曾先生是一位印尼归侨，原籍福建泉州，在印尼时，不光会听而且能讲一些客家话。他是语言专家，对汉族八大方言的辨别能力当不成问题。据他介绍，存在类客方言的地区是在黄河流域经陕西、山西、河南交界部最狭的一段，包括从陕西东部的龙门坝上、韩城、合阳至潼关以西的长安县，东至山西的风陵渡、芮城和河南的灵宝县；还有在陕西中部以黄陵为中心的周围地区。也就是在陕西中部的洛河和黄河河曲之间，晋陕豫三省接壤的三角地带。黄遵宪《梅州诗传序》中所谓之“此客人者，来自河洛”。可能指的就是这一地区。（注：洛河有两处：一条是发源于陕西西北部，流向东南至潼关北部入黄河的陕西洛河；另一条是发源于陕西东南部洛南县的洛源，向东流入河南西部经洛阳北部入黄河的河南洛河。）由于路程较远，时间不足，考察团未克前往查证，实乃一大憾事。弄清楚这些类客方言地区的情况，当对客家民系语言文化的特征及其渊源、发展等重大学术问题提供科学的依据。但愿能在近期内补上这一课。

考察团在豫南的光山、固始、潢川、新县等民间姓氏族谱和地方史志中，都发现有关唐末中原这一带先民南迁江西鄱阳县筷子巷，明洪武二年开始又从这里回迁到中原的记载，而在赣南、闽西的有关客家先民的迁

史籍中却中断了这一环节。但是，在闽、粤、赣的客家地区却也保留有插筷子或插刀子的祀祭习俗，这是值得考究的。有两种可能：一是在当时中原先民南下到长江南岸（江右）进入江西鄱阳湖地区之后，一部分滞留在鄱阳县一带，另一部分则继续南下，进入到赣南、闽西地区。滞留在鄱阳湖畔，以后又回迁中原的这一部分成为现在豫南的先民，而进入到赣南、闽西的这一支则成了客家先民。第二种可能是，在鄱阳湖畔这片渔米之乡，可能是当时中原移民理想的休养生息的地方，在居留一个时期以后，再从这里回迁中原或南下闽赣，成为中原移民回迁和南移的分水岭。有必要对鄱阳地区的历史文化与现状作一番实地调查，才有可能对客家的历史和界定问题提供更充分的依据。

有关“客家妇女历来没有缠足陋俗”之说，近百年来一直成为中外学者赞扬客家妇女之美谈。可笑的是竟然也有一些喜欢“想当然”的“专家”，试图借助“客家妇女不缠足”和“善唱山歌”的特点，作为论证客家人是中原南下汉民跟南方少数民族的混种。其理由是中原汉民在兵荒马乱中千里跋涉南迁的情况下，老弱妇孺，特别是缠着小足的妇女，是不可能跟随到达南方目的地的，留下的精壮男子只能就地跟少数民族（主要是畲族）通婚。因为据说在我国历史上只有少数民族才不缠足。这也是一种“想当然”的无稽之谈。据有史可查，我国缠足陋习始于南唐（公元937—975年）。当时的南唐是五代十国中封建制度较完备和较强的国家，“南唐的金陵商业兴旺，物品丰富，经济十分繁荣。尤其是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酷爱读书，以文学取士，金陵的文化骤然昌盛。宫女宦娘，足缠如弯月，轻歌曼舞于六尺高的金制莲花之上，取得后主的宠幸，缠足之风由此盛行”。（丘菊贤、杨东晨著《中华都城要览》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在

南唐以前我国的历史上并没有关于妇女缠足的记载，从南唐至清代，仅有七百年历史，而南唐所统治的区域也仅得江浙安徽等南方几省。当时的缠足陋习也并不是一种全国性的现象。

考察团在河南光山县查阅《光山县志》中未见有妇女缠足之记载，特别是“在乡则山居谷汲，妇女多自理园蔬，盖不分男子力田之务，有荒稼穑耕耘，饁饷宛然《幽风》之遗也”。然而，在赣南《石城县志》中却有妇女缠足的记载：“封建社会妇女以缠足视为‘美’的象征。民国时期政府虽提倡‘天足’、反对缠足，但缠足者依然很盛。直至抗日战争后，此习始逐渐消失”。

可见在中原客家先民的祖居地，历史上也有妇女不缠足的。而在客家民系的形成地倒有妇女缠足的陋习。但是在宁化以南的上杭等县及广东客家地区就没有关于妇女缠足的历史记载了。

联 想 与 建 议

考察团此行对九省市的考察活动期间，广泛接触了社会各界人士，尽管对有关客家问题的认识有浅有深，但都普遍认为我们近年来加强对客家研究和海外联谊工作意义重大，是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和促进内地经济发展的一项大事。目前河南各地打算更好开发中原大地的历史文化旅游资源，加强对外开放和经济文化交流。河南郑州市正筹备在近期成立“中原客家联谊会”；周口地区的淮阳县，还由县长牵头成立了“淮阳县陈氏宗亲研究会”以增强民族团结，满足海内外陈氏子孙寻根问祖要求，推动淮阳经济文化建设为宗旨，跟海外和台湾建立了广泛联系；江西省中国客家问题研究中心和赣州地区都将于年底举行客家问题研讨会；福建三明市和宁化县在开展客家学研究和对外联谊交流

方面，已制订出全面规划，软件硬件一齐抓，办了许多实事；龙岩地区计划在今冬明春完成《客家学概论》、《客家史》、《闽西客方言》等几部专著，并策划于明年三月举办一次大型学术活动和经济文化交流盛会；广西和海南省也将在最近举行大规模的客家联谊活动。今年五月，在上海还召开了一次具有国际性的客家学研讨暨客家联谊大会。由此可见，以1989年冬广东梅州举行世界客属联谊大会为氏契机，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增强民族凝聚力为主旋律，以开放改革为主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客家研究为突破口的“客家浪潮”正在波及全国各地，1994年世界客属第十二届恳亲大会又将在梅州召开，面临这一形势，从梅州所处的位置和应发挥的作用，应该说有许多工作还是做得不充分的。譬如旨在增强民族凝聚力，振兴客家地区经济文化为主题的总体规划，相应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健全有关内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渠道和组织体系等等。当务之急是要改变我市在客家研究（包括经济、文化）方面力量分散和学术工作的落后状况。建议：

（一）加强梅州客家联谊会组织建设。所属四部一会（即客家历史文化研究部、客家华侨华人研究部、对外联络部、客家经济发展部、客家联谊会基金会）要充实力量，聘请一些（包括离退休人员中的）有识之士参加实际工作。各县区的客家联谊会及嘉应大学客家研究所，也应进一步健全充实力量，发挥主动性，多做一些扎实的工作。

（二）市县区都要制订出一个“弘扬、联谊、振兴、发展”的总体规划，办几件实事。

（三）加强对内对外联络和经济文化信息交流。特别是粤闽赣三省边区加强协作。

（四）加强梅州的“客家学”学术建设和文献资料出版工作。成立市县两级客家学研究会。

一九九一年石碧客家祖地的对外宣传工作取得新成效

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有以下海外报刊刊载了介绍宁化石碧客家祖地的信息：泰国《中华时报》刊登文章题为《闽西宁化县石碧村为客家南迁中转站》；菲律宾《世界日报》发表中新社报导《宁化探索客家文化》，新加坡《南洋客家总会成立六十周年纪念特刊》登载《宁化石壁——客家南迁的中转站》、《客家的第二故乡——宁化石壁》、《宁化客家姓氏的由来及历史渊源》及一组照片《石碧民俗介绍》，美国《世界日报》（中文）报导宁化客家研究情况及刊物；香港《华侨报》发表《客家祖地闽宁化县致力客家文化探索》；台湾《中国时报》发表新华社报导《“客家衍四方，朝夕不忘祖”——客家祖地宁化石碧村探访》并附照片二组。

（刘善群）

（五）建议在1994年世界客属第十二届恳亲大会在梅州召开的同时，举行一次客家问题的国际学术交流会。这一工作，必须事前有充分准备。

考察团将根据此行考察的见闻和认识，分别撰写专题论述，并要求在近年内继续完成对河曲地区和鄱阳地区的调查考察任务。



广东梅州客家
历史文化考察团
1991年11月20日

宁化石碧客家研究的意义

陈国强 周立方

在闽赣交界武夷山东麓的宁化县，有个石碧村，距县城西部25公里，现属禾口乡的一个行政村。这里原是一片较开阔的盆地，森林茂密，宛如一堵绿色屏障，故在唐以前称为“玉屏”，唐代中期改名“石壁”，意为虽屡遭外犯，但却是“吃不下，嚼不烂”，宛如一道攻不下的石壁；后来又谐音改写为石壁、石碧。石碧在古代是由赣入闽的重要径口，周围有高山，有溪流，有山有水，可进可退，在中原动乱中，这里一直较安定。因此，石碧便成为古代中原汉人南迁后的集居地，并从这里转迁到各处，被誉为“客家南迁的中转站”、“客家的第二祖籍地”、“客家的第二故乡”，甚至直接称为“客家的摇篮”、“客家的发祥地”、“客家的祖地”。

客家是中原汉人南迁后的称呼，是汉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史称“客家人”。中原汉人南迁始于东晋；唐代以后流迁的被称为正宗的客家人，大多经过宁化石碧，并在石碧生息、繁衍数代甚至数百年，以后再从石碧陆续辗转至闽西、广东、广西、四川、湖南，以及香港、台湾和东南亚各地。这些从石碧迁到闽、粤、台及其他各地的客家人，多自称一世祖出自石碧，故宁化石碧便自然地成为“客家摇篮”、“客家的发祥地”、“客

家的祖地。”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东南亚各地，约有五千多万客家人，他们大部分的族谱中，明确记载其祖先来自福建宁化石碧。

古代石碧的范围比现在石碧村大，现在石碧村有二十余个自然村、2111人，绝大多数姓张，其他只有刘姓2户，傅姓3户，李、雷各一户。但在历史上，石碧客家却有邓、巫、罗、温、刘、薛、李、吴、张、赖、谢、廖、曾、孙、甘、周、陈、范、戴、黎、王、傅、江、卢、梁、蔡、魏、钟、洪、黄、伍、侯诸姓。据不完全统计，在石碧住过的客家有八十多个姓，现在各地客家人有六十多个姓是从石碧和宁化迁出的。即以台湾客家来说，诸如黄、丘、李诸姓，都可查考到来自宁化石碧的记载。客家在长期历史文化发展中，在语言、性格、风俗、建筑、食品、衣饰等方面，产生并保留有鲜明的特色。

当前，客家研究已成为世界性的热门学科，据说世界性的崇正客家同乡会，每年都组织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讨论客家的历史与文化问题。有关学科如语言学、民间文学、历史、地方志、考古文物、民族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与客家研究都有着密切的关系。现在，对客家的研究，尤其对

宁化石碧客家的研究具有政治、经济、学术等方面的重要意义。

(一) 政治上的意义是：加强我国民族团结，促进海峡两岸统一，寻根增进感情。

第一，我国是一个包括56个民族的统一国家，其中汉族占人口的90%以上，汉族也包括客家人在内。现在有的外国学者将客家当作一个民族或种族集团是不对的，客家只是汉族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众所周知，我国又是一个多元一体化的国家，多元表现在民族众多和民族内部的不同成分上，但从经历道路共同走社会主义大道却是一致的。中原汉人自东晋(317年)开始南下至江西、安徽、湖北等地；自唐末(880年)住江西部分又迁至江西东南、宁化石碧和闽西、粤东等地；宋高宗南渡(1127年)后再迁至粤北等地；自明末清初(1645年)继迁至粤中部沿海地区与台湾，以及湘、川、黔南、西藏会理；同治(1867年)以后，再分迁到粤南、海南岛以及东南亚。由上述客家的形成和迁徙，说明宁化石碧客家占有极重要地位，对石碧客家的调查研究，将有助于对汉族及客家历史的认识，促进民族间的和睦团结。

第二，海峡两岸由于人为的原因，长久隔离不相往来，研究宁化石碧客家有助于海峡两岸的彼此了解，促进统一祖国大业。台湾客家多源于宁化、石碧，如在台湾开基的黄氏家族中的粤香派和浦西派，正是居住在宁化县龙上里的黄宁后裔。遍布台湾南北各地的丘(邱)氏家族的“三郎公”宗派，祖先即在宋太宗、真宗年间到宁化石碧丘家坊开基的“三郎公”丘法言。从海峡两岸客家人的来源迁徙历史发展，以及两岸文化变迁的研究，有助于闽台两地客家密切关系的了

解，增进同根共祖的认识，有利于统一祖国神圣大业。

第三，研究宁化石碧客家的历史与文化，有助于台、闽、粤各地客家人和寻根祭祖，以增进感情，加强各地方的友好团结。据初步调查：石碧客家迁居台湾的有：巫罗俊在唐太宗时奉令镇守南疆，居宁化黄连峒(今县城)，明清时，巫氏子孙迁至台湾。罗景新居宁化石碧村，裔孙德达及叔强孙裔孙彦邦、彦章各支派下，分别渡海到台湾。李珠迁居宁化，生五子，其中李火德在宋末元初迁居上杭，为台湾李氏始祖。陈氏也自宁化迁大埔后去台湾。因此，台湾的客家人多可到宁化石碧寻根访祖。此外，分布在福建、广东各地的客家人也多来自宁化石碧，如广东梅县等地客家人曾组织代表团，到宁化石碧寻根访祖。除上述各姓氏外，闽粤台各地的杜、白、宫、范、雷、詹、严、龚、方、管、何、朱、郭、杨、卜、古等姓，也是由宁化石碧迁出繁衍的。据初步统计：在台湾三百多万客家人中，其中有二百多万客家人是传自宁化石碧。还有人统计：从宁化石碧客家分迁到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多达五千万人。如果能把宁化石碧客家的历史与文化调查研究清楚，就可以密切各地关系，增进感情，便于寻根访祖。

(二) 经济上的意义是：介绍分析宁化石碧的美好自然与社会环境，有利于加强福建与省外各地客家的交流，并吸引台胞投资建设家乡。

第一，加强宁化与闽西、南，以及粤、川、桂、豫、浙、鲁，和贵州、山西等省的联系与物资交流。众所周知，宋代以前闽粤交界山区人口稀少，由于石碧客家的经营与

外迁，至明末才开发了这一地区，如太平天国洪秀全的祖先，就是在宋末由石碧迁到广东梅县开基的。明清时代，闽粤赣三省边区又向外持续的大批移民，石碧客家陆续迁到台湾、四川、湖南、广西、河南、浙江，山东及贵州、山西等省。因此，研究石碧客家的历史与文化，可加强与这些地方客家人的密切关系，吸引他们前来寻根访祖，共同开发和建设宁化石碧祖籍地。

第二，客家人善于经营工商业，目前除大陆各地外，在台湾也有不少客家人实业家。他们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经济力量。研究石碧与台湾客家的历史渊源关系，以及客家文化的特点与变迁，不仅有利于大陆各地客家对祖籍地客家的了解，也有利于台湾客家人对祖籍地石碧的了解。现在，宁化地处闽西山区，交通较不便，但气候适宜，土地肥沃，物产资源丰富，人口密度小，有丰富的劳力资源。像其他山区一样，宁化是个农业县，地大人少。而台湾客家人有不少是各行业的实业家，只要他们了解宁化，尤其了解石碧的情况，就有可能增加对宁化、石碧，甚至三明市的投资，为共同开发和建设客家祖籍地贡献力量。

(三)学术上的意义是：研究石碧客家是客家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研究客家中所不可缺少的。同时，对研究语言学、历史学、民间文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语言学说：客家话形成的时期，正是客家南迁到石碧最兴盛的时期。宁化石碧既是客家的摇篮，也应是客家话的发源地。客家话是汉语中的一种方言，有的学者认为客家话的浊母清化是在石碧形成的。研究石碧

客家话的特点，对于认识、比较各地客家话，进而追溯其渊源发展，意义重大。这里还要顺便提及的是：现在主要分布于闽、浙、赣的畲族，一般也使用客家话，但是保留有本民族语言的一些词汇。为什么不同于汉族的畲族会接受使用客家话？究竟畲族说的客家话与原来客家话有什么关系？畲族与客家人有什么关系？从研究宁化石碧客家话的特点与变迁中，也许可找到一些线索，其意义就不仅局限于语言学了。

从历史学说：客家南迁形成发展的历史，是汉族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有关省、市（县）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既然石碧客家是客家南下的发祥地或中转站，研究石碧客家的来源与迁徙，对了解各地客家的渊源关系，非常重要。至于客家考古文物的研究，对探讨石碧客家的来源与迁徙，也可提供实物的证据。

从民间文学说：民间文学可在石碧客家中寻找养料，石碧实在是文学采风的宝库。客家的山歌、情歌，富有民间文学创作特色，过去常为人们所称道，还有石碧客家的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间艺术等作品，还有待人们去探讨和发掘。

从社会学说：石碧既是客家的发祥地和中转站，他们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特点，以及今日石碧的社会现状与问题，都提供社会学者以新颖的材料，需要认真调查研究。

从民俗学说：石碧客家还保留有古代传下来的民俗，包括：节日习俗，婚姻丧葬，妇女的船形髻，大襟衫，花边裤，花围裙，花布鞋，以及饮食习俗、建筑特色等，甚至如端午节在家门口挂艾枝和葛藤等，以示敬老和避邪。这些民俗特色，至今许多地方的